

人口流动与 家庭关系的变迁

——甘肃岭村调查

连芙蓉 著

POPULATION FLOW
AND
THE CHANGES
IN FAMILY RELATIONS:
A Survey on
Lingcun,
Gansu Provin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人口流动与 家庭关系的变迁

——甘肃岭村调查

POPULATION FLOW AND
THE CHANGES IN FAMILY RELATIONS:
A Survey on Lingcun, Gansu Province

连芙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的变迁：甘肃岭村调查 / 连芙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201-4674-6

I. ①人… II. ①连… III. ①农村-人口流动-关系-家庭关系-研究-甘肃 IV. ①C924.24②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8832 号

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的变迁

——甘肃岭村调查

著 者 / 连芙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胡庆英

文稿编辑 / 孙智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5 字 数：17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674-6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获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经费资助

前言

我的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生活经历，另一个是理论知识的获得。

我是一个从西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农村的生活伴随了我整个少年时光。同时，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人，对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印象深刻。从我记事起，三姑就一直是一个人打理家里的大事小情。不是因为她没有丈夫，也不是因为她没有孩子，而是因为我姑父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三姑的两个女儿一个出嫁，另一个也在外面打工。这几年，三姑家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房子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装修了，家里不仅多了空调、冰箱，就连三姑的电动摩托车也已经换了两辆。

不过我想，三姑是寂寞的，要不然她不会三天两头地去我家，也不会一天十几个小时用手机挂着 QQ，更不会有事没事的时候自己也琢磨着要出去打工。用家里人的话说，她这几年一直“折腾”得就没消停过，2012 年去给姑父做了大半年的饭，2013 年去西安打了几个月的零工，前不久又跟我说想去四川。在我们那，像三姑一样独自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还有很多，为了生存，她们和家人都不得不选择暂时分开，“分而不离”的家庭背后是她们和家人无奈的叹息。

第一次接触东乡族，是在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里。作者描述的一群在兰州市从事废旧家具家电收购的东乡族人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又了解到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主要来自东乡县 Q 乡。他们大多是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一年到头也就农忙和过节的时候回家一两次。除了做废旧家具家电回收的小买卖，有的人也在建筑工地上打零

工,也有的卖旧木料。当然,最有钱的还是那些拥有拆迁公司的人。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初级产业链,拆迁公司的人负责大生意,把从旧楼房上拆下来的木头卖给自己的同乡,然后那些收废旧家具家电的老乡也会得到消息,蜂拥而去。但这些都不是我的研究志趣,我想知道,家庭观念如此厚重的中国人,他们为什么会背井离乡在外拼搏?他们为什么大多都是单身在城市生活?他们的老婆孩子呢?他们的父母呢?在农村的家怎么办?他们出来之后,夫妻感情如何维系?孩子靠谁抚育?父母靠谁赡养?原来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哪些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疑问,才是我本项研究的重点议题。

社会学家强调,没有不受社会发展、变迁影响的家庭。离开了社会,也就无所谓家庭衍化的客观规律,家庭衍化和变迁都是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①因此,我们要研究家庭、研究家庭的变化,就必须首先考察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社会持续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美国社会学家威廉·J. 古德在他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一书中指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其强大的社会威力影响着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在新几内亚、中国、南斯拉夫这些相距遥远、文化迥异的国家中,传统的家庭制度都在变化——这又何尝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呢?”^②当然,我们不能直觉地认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产生现代家庭变迁的唯一力量,许多家庭变革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发生,而且无疑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全然不同的力量之影响下发生的。古德就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仿佛一个百宝囊,它包含了许多大相径庭的势力和进程。除非我们搞清楚哪些次要因素是引起变化的原因,除非我们搞清楚有哪些连锁反应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影响,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③因此,假若我们断定工业化具有某种特殊作用,我们必须阐明工业化如何改变社会控制力量对丈夫、妻子、儿童或亲属所产生的作用。^④我们必须弄清楚工业化的这些因素怎样改变了权力、声望或财富杠杆,从

① 杨善华:《家庭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1页。

②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页。

③ 威廉·J. 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6页。

④ 威廉·J. 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7页。

而使家庭的不同成员或家庭、亲属群体内部的不同关系变得紧张，或者可以避免这类紧张关系。^① 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家庭变迁，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变迁背景、具体变迁过程和具体变迁现象等有深刻的认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和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样两个转变时期，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变。^② 不可否认，在这两个转变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许多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现象莫过于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出现，尤其是“民工潮”的出现，这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引入，阻隔城乡联系的各种制度逐渐松动，这必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已达11379.22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10年之间增加了736.26万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数量也急剧增长。以兰州市的东乡族为例，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兰州市的东乡族人口为4972人，而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5567人，净增10595人，增长幅度达两倍之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的改变，社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也使他们的家庭发生方方面面的变化。

家庭的变迁不仅直接改变微观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会在宏观层面影响社会的生产/再生产系统，影响这一社会生产/再生产系统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化工程中的方式。^③ 就像这些在兰州市的东乡族人一样，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同时，他们在城市能否健康地生活、有尊严地生活也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关系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开展，尤其是对兰州市这样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来说。因此，研究这种流动行为对少数民族家庭产生的影响，其意义将超出家庭范围。

① 李东山：《工业化与家庭制度变迁》，《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李银河：《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③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	001
第二节 人口流动相关理论视角	014
第二章 岭村：历史	019
第一节 岭村的确定	019
第二节 岭村的建置沿革与自然环境	020
第三节 民族形成与经商传统	023
第四节 制度变迁与农民流动	027
第三章 岭村：现实	034
第一节 岭村的人口增长	034
第二节 岭村的经济生活	039
第三节 岭村的教育	043
第四节 岭村的人口流动	047
第四章 社区、家庭和人	051
第一节 村落社区：多元力量的共同产物	051
第二节 社区的家庭之间：弱化与强化同在	058
第三节 父权制镜像下的人：性别角色固化	061

第五章 流动家庭内部关系：夫妻关系	065
第一节 夫妻经济关系：各司其职	067
第二节 夫妻权力关系：让渡与协商	072
第三节 夫妻情感关系：平淡中的稳定	077
第六章 流动家庭内部关系：亲子关系	083
第一节 抚育子女：困境与希望	083
第二节 赡养老人：理想与现实	090
第七章 流动家庭外部关系：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	099
第一节 亲属关系：重家伍轻亲故	101
第二节 邻里关系：淡化还是强化	109
第八章 总结与思考	116
第一节 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变迁	116
第二节 社区的力量	119
第三节 家庭对社会的反作用	123
第四节 重塑健康社区支持	128
参考文献	133
附录 1	142
附录 2	146

| 第一章 |

导 论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

从 19 世纪的西方到 21 世纪的中国，都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席卷了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细胞的家庭当然也深受影响。当然，学术界对家庭的研究也就转变了方向，从刚开始的家庭发展史研究转到探讨工业化、城市化所产生的后果对家庭的影响，再到关注家庭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强调家庭的主观能动性，探讨家庭对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影响。

而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西方家庭社会学的研究焦点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对家庭结构的关注逐渐转向对家庭关系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家庭区别于前工业化家庭的核心内容不是从血缘扩大家庭制度转变为核心家庭制度，而是家庭关系的变化，包括私人家庭生活内部关系、家庭与亲属群体关系以及家庭与外部社区关系的全面转变。^① 笔者也认为，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的变动都只能反映家庭变迁的表面和形式，却不能反映家庭变迁的实质，而家庭关系是家庭生活的动态因素，不仅能反映家庭形式上的变化，而且能反映家庭本质上的变化。因此，本研究在城乡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重点考察和关注东乡族家庭成员的外流对其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外部关系的影响。

^①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

一 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的研究

人口流动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改变了家庭成员原有的联系方式和沟通方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职能发生某些变化，因此，也必然影响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家庭内部成员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美国学者帕森斯指出，“孤立的核心家庭可能有益于满足工业城市社会固有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核心家庭不受强制性的扩大亲属关系的妨碍，它能最快地搬到工作场所附近去，能更充分地利用就业机会……”。他的著作主要是参照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写的，试图提出家庭和社会间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他指出：“1）家庭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和福利机构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作为一种社会化和抚养子女以及为成年人提供心理支持设施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2）大亲属关系群体的分解和核心家庭内部关系的增强；3）妇女与家庭私人领域的关系以及男子与政治、经济公共领域的关系。”^①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发生在家庭结构和活动方面的这些变化其实是对社会其他方面变化的一种适应。

而古德认为，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并不是工业社会所特有的，在前工业社会的欧洲就已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帕森斯割裂了现代与历史的联系，片面地认为“孤立的核心家庭”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工业家庭，与前现代、前工业家庭是截然不同的。前工业社会也存在核心家庭，不同工业社会在家庭模式和价值观方面是不同的，今天的家庭模式和价值观是对过去的家庭模式与价值观的承续。如英国历史上存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依然在发挥作用，日本的家庭模式至今还建立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强大的血缘关系纽带。古德把夫妇式家庭看成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并且以和帕森斯差不多同样的方式认为它是适合工业经济制度需要的。他说，夫妇式家庭的意识形态鼓励爱情，并且维护超越于对群体义务之上的个人权利。^②

日本学者望月嵩在《家庭关系学》一书中，研究了因“单身赴任”而产生的留守家庭的子女教育和夫妻关系问题。所谓“单身赴任”，就是指企业的雇用劳动者，也是拥有自己工作的丈夫（或父亲），他们本来应当

① 艾略特：《家庭：变革还是继续？》，何世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8页。

② 艾略特：《家庭：变革还是继续？》，何世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73页。

与妻子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而不得不离开家人，单独到比较远的工作场所去工作和生活。日本这种“单身赴任”家庭产生的时间在1960年左右。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产业化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工薪阶层工作场所的转移也越来越频繁，“单身赴任”的情况也急剧增加，出现了“札幌光棍儿”“广岛光棍儿”的说法。这些工薪阶层像光棍儿一样生活。“单身赴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作为解决工作单位与家庭之间对立和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它给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夫妇的情感与性关系，以及与子女的关系方面，从而产生了婚外恋、夫妻关系的破裂、子女的社会化等问题。^①

国内学者周伟文等在专著《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一书中，提出了半流动家庭与双流动家庭的概念。作者认为，农民的流动与家庭的变动之间的相关度很高，不同的流动方式对农民家庭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根据农民就地转移、季节性流动和夫妻双双流动到城市从事个体经营或打工这三种不同的社会流动类型提出了这两种家庭形式。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元体制的制约，离农人口面对可流动但难转移的结构性约束，他们的两栖化生活对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不能实现个人身份的真正转变，也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转移，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流动农民家庭普遍存在夫妻长期分居的现象，城乡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对他们不同的影响，对他们稳定而保守的婚姻关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二是夫妻双双流动的家庭为了经济利益，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交给老人和亲戚看管，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成为这类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②

龚维斌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过程中家庭关系的两个方面——情感关系与权力关系——各自的变化状况以及相互影响的变迁过程。作者指出，“在情感关系方面，夫妻双双外出的家庭，无论是在早期还是近期，基本上都能保持良好的情感关系，甚至在外出就业的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过程中加深了理解，增进了感

① 潘鸿雁：《适应与变迁：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研究——以定州农村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6，第8页。

② 周伟文、严晓萍、刘中一：《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16页。

情；而夫妻一方外出的情况则不同，对情感关系有可能没影响或者是好影响，但也有可能是坏影响。在权力关系方面，由于子女外出就业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他们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上升，成为家庭事务的决策者，使得老人的家庭权力处于边缘地位；女性劳动力的外出，也使得那些作为人妻的妇女有可能成为家庭的主心骨，对家庭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提高。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并未对家庭团结造成震荡，相反，家庭成员之间更加团结，感情更加深厚。那是因为人们外出就业引发或加速的家庭权力结构变动所产生的权力秩序，先赋性因素减少，自致性因素增多，人们在外出就业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实践表明了自己的实力，从而在家庭中建立起较高的权力地位。而且这种新的权力是以个人品质与能力为基础的，大家对它是自愿服从”^①。作者认为，这种建立在感情与权威基础之上的现代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根据研究内容和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总体的家庭关系分为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外部关系。

（一）人口流动与家庭内部关系

家庭内部关系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1. 夫妻关系

李强通过对北京农民工家庭的个案调查将流动农民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子女外出、兄弟姐妹外出、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全家外出等五种类型，并且认为分居的家庭模式，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会是我国农民家庭的主要模式。^②他认为，“农民工家庭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即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长时期与家庭其他成员分居，当然其家庭关系还是继续维持着。虽然，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并且在‘文革’时期还变得比较严重，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农民大规模的、持续的并不断增长的家庭成员分居现象，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③。

孙慧芳、时立荣通过对太原市城乡接合部H社区流动家庭的调查，认为经济目标和传统因素在流动家庭的生活空间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① 龚维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变迁》，《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李强：《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③ 李强：《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社会生活空间变化和传统因素相适应的过程中,夫妻间一种稳定的“亲密伙伴”关系得以形成。^① 罗小锋基于对 34 个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农民工夫妻尽管面对时空分离,但他们采取各种策略能动地维系彼此关系,克服时空隔离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促进了夫妻关系的稳定,维护了家庭的完整”^②。张传红通过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 89 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了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分工的结论。^③ 同时她们还对这 89 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夫妻家庭性别关系的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详细探讨了流动对夫妻性别关系满意度的影响。^④ 也有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婚变问题和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主要研究了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的影响。李小云认为,妻子留守使女性为家庭创造的价值显性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⑤ 同时,马春华通过对四川一个外出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乡村的调查,发现当地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妻子外出打工、丈夫在家带孩子的别样性别分工模式。^⑥

2.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通常指的是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中仅次于夫妻关系的重要角色关系。它反映的是纵向的代际关系,其中核心部分是向下对子女的抚育和向上对父母的赡养。

帕森斯的学生尼尔·J. 斯梅尔塞认为,“在工业化以后,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教育和经济功能,这些功能由学校和经济组织所取代。由于家庭

① 孙慧芳、时立荣:《农村流动家庭的夫妻关系研究——来自太原市城乡接合部 H 社区的调查》,《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

② 罗小锋:《时空伸延:半流动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维系策略》,《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③ 张传红:《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④ 张传红、李小云:《流动家庭性别关系满意度变化研究——以北京市农民工流动家庭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1 年第 4 期。

⑤ 李小云:《“守土与离乡”中的性别失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⑥ 马春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社会变迁过程中川西竹村家庭性别关系的变化》,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不再是一个生产性的经济单位，家庭成员便可以走出家庭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求雇主。随着家庭在经济方面的功能的衰退，最终普遍地导致父系权威的下降：家庭活动更多地集中于情感上的满足和对子女的社会化。由于父亲在外供职，母亲同子女的情感依恋便愈加强烈”^①。斯梅尔塞进而总结道：“现代化形成了一种以情感吸引和一种狭隘的爱情为基础的家庭。除了每个家庭成员各自与外部的联系外，家庭不再作为重要的社会领域。”^②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造成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疏离，并对其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和社会化过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击。流动人口的子女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跟随父母一起流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另一部分则留在家乡由他人代养，由此成为留守儿童。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在城市的受教育情况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外界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流动人口家庭本身的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学者们更多关注的则是他们的家庭教育问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正面来看，外出务工增强了农村家庭对子女受教育的支付能力；从负面看，由于亲子之间交往时间上的长期间断性、空间上的远距离性，使互动的频率极低，从而造成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化的不足。”^③ 罗小锋基于对 34 个流动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尽管面临与留守子女空间上的分隔，但外出父母仍能通过各种策略性安排进行跨域抚育。^④

人口流动对其向上的亲子关系的最大影响就是加剧了传统父辈权威的衰落，同时对农村家庭的养老模式也造成了冲击。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经济机会不断扩展的社会里的人们不会感觉到长辈的权力。东方的农业封锁了经济发展的机会，而西方的工业却打破了这道封锁线。……经济的封锁线既然已经被科学打破，人类的机会可能会有增无减，老年人所持以获得

①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37 页。

②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38 页。

③ 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上海教育科研》2002 年第 9 期。

④ 罗小锋：《流动民工家庭跨域抚育策略的研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尊敬的基础似乎已经动摇了。^① 父辈权威在传统农业领域逐渐丧失，在城市生活领域让位，子女的地位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得到提高。^② 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弱化了传统家庭之间的社会规范和代际关系；另外，外出人口价值观的改变，削弱了传统的孝道观念，劳动力的流动减少了年轻一代支持他们父母的意愿和能力。^③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造成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心是老年人，而现代家庭的代际重心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孩子”^④。目前学界研究都较一致地认为子女外出给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带来很大挑战。

（二）人口流动与家庭外部关系

家庭外部关系是和家庭内部关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家庭成员的个人关系向外延伸的结果，主要包括家庭与亲属群体的关系、家庭和社区的关系等。

1. 亲属关系

大多数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导致了亲属关系出现逐渐弱化的趋向。如帕森斯参照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对亲属关系的功能主义的描述：“家庭向现代性的转变需要以亲属关系团体分解和一种家庭体制的出现为前提。在这种体制下，核心家庭的成员摆脱了对较远的亲属的义务，配偶间的义务相应得到了强调。……核心家庭成员有时与其他亲属保持联系，但这种关系没有结构基础，而且在逐渐减弱。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是与其他亲属相独立的，它组成一个孤立的家庭生活单位，而且按照明确规定的血统准则，它对母亲家庭和父亲家庭都没有任何义务关系。……姻缘纽带成了现代家庭的‘结构基石’。”^⑤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关系渐趋核心化、非亲属化，职化流动拉大了亲属间在地理与社会上的距离，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三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291~293页。

② 龚维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变迁》，《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H. L. Wilensky, *Rich Demographics: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891.

④ 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

⑤ 艾略特：《家庭：变革还是继续？》，何世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9~40页。

降低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的依赖程度。

“哈雷雯在对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和新罕布什尔移民工人的亲属模式这一著名的研究中发现，与其说亲属关系‘压制个人’和妨碍流动，倒不如说亲属关系充当了个人和家庭从前工业环境到工业环境的传输工具。工人在亲属群体中迁移并且带着亲属援助的传统模式。这种与亲属群体密切互动的家庭关系被哈雷雯重新定义为一种对新经济机会做出反应的传统生产模式。但是她同时强调，这些关系与他们在农村时的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更多的经验研究也显示，传统的习惯以及传统的人际关系不仅使劳动者更能适应工业化过程，而且直接地支持了这一过程。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明显，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① 笔者在调查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流动行为的实现，亲属关系的帮带和援助作用非常大。

潘鸿雁在《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一书中，通过对翟城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的调查发现，居住地之间的远近与亲属之间的联系程度直接相关，居住的距离越近，亲属间实际的来往越多，其交往互助也越多，彼此能够为对方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当然亲属关系就越亲密。同时，在翟城村，除了先赋性的血缘关系构成的正式亲属关系外，关系网中的多数关系（诸如姻亲等）是靠村民们自己建立和培养起来的，这种关系网可以看作是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体现，反映了农民日趋理性和功利化的行为取向。而且这种实践的亲属关系主要是以女性为主体展开的。^②

王跃生认为，家庭核心化在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并不意味着父子、兄弟分别生活的家庭之间联系的下降。农业生产的单位虽然依然是家庭，但已婚分居子女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家庭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临近以及人口流动性小，日常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而恰恰是因为家庭成员流动行为的增多，拉大了这些亲缘家庭在空间上的距离，使得日常生活的互助和养老责

①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② 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121 ~ 122 页。